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学担当

徐明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学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方面肩负着特殊责任,取得显著成就,也需要接续奋进,贡献新的力量。

一、自主的脚步:中国政治学的迭代更新

政治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主要围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展开。

一是思维自主,表现为对中国政治的核心判断从病理思维转向生理思维。病理思维大多将中国政治视为病态,认为中国政治的发展目标是向西方转型。研究者并不关注、也不认可中国政治存在制度优势。与之相反,生理思维充分认识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的伟大成绩,并尝试从政治学的角度回答“中国奇迹”,由此,研究者开始分析中国政治的运作机理、总结中国政治的制度优势。这种思维自主是中国政治学能够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前提。

二是视野自主,表现为研究者的关注点从文本转向事实。这种转变是中国政治学走向实证的结果,也是中国政治学自主发展的重要特征。中国政治处在怎样的历史轨道、特定政治制度如何运转,这些问题只能在事实层面予以回答。由此,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政府过程研究、基层治理研究等强调事实的学科方向发展迅速。研究者走向基层、挖掘史料、收集数据,以一手资料为基础,刻画中国政治的运行规律,总结中国政治的制度优势。

三是方法自主,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并存。当前,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侧重实证分析,但并不排斥规范研究,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研究依然富有生命力。在实证分析方面,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驾齐驱,史料考据、社会调查等“传统功夫”,大数据分析、实验研究等“新派招式”,在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均有用武之地。这种多元并存的方法论特征,反映出中国政治学的开放包容,更反映出中国政治学在方法论层面的自主性,研究者以求真务实的原则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而非为方法所困、拘泥单一策略。

二、不懈的探索:中国政治学任重道远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要求研究者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扎实的经验研究,完成一次系统性的知识创造。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任务。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学的脚步并不轻松。

一是面临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的隔阂。政策话语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源泉,但政策话语并不是学术话语,两者之间存在“转译—反馈”的过程。研究者需要将政策话语转译为学术话语,形成科学化的概念与命题,同时也需要将学术话语反馈到政策话语,实现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客观而言,这个“转译—反馈”的过程并未充分完成。直接用政策话语取代学术话语,“只讲政治而不讲政治学”;抛开政策话语只讲学术话语,“为学术而学术”。这两种问题都还存在,但无论哪种问题,导致的结果都将是中国政治学的裹足不前。

二是概念与理论创新的层次相对较低。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概念和理论创新,对此研究者做了大量工作。有些“新概念”“新理论”达到了“知识”的层次,构成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如“党政体制”“使命型政党”“压力型体制”“职责同构”等。也有一些概念与理论创新还处在低层次的“造概念”“造理论”状态。这并不是说这些低层次的概念与理论创新没有意义,而是说这是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哪些概念和理论创新能够获得学界认可,成为“知识”,需要实践的检验,也需要时间的沉淀。

三是知识体系的普遍性相对较弱。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层目标是消解西方中心主义,构建基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地方性知识”。第二层目标则是以中国为基础构建具有全球意义的“普遍性知识”。现在来看,当前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主要指向第一层目标,在第二层目标上表现得相对较弱。以中国故事为基础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发展经验,推动中国政治叙事的世界表达,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未来的道路:中国政治学的再度出发

从学习西方经验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个过程是艰辛的。在此期间,中国政治学需要“再度出发”。

首先是推进政策实践和学术创新的融合。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创新比其他学科更贴近政策实践,政策实践学术化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任务。有些政策实践可以直接学术化,如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这些实践本身就可以为民主理论、政体理论贡献中国智慧。有些政策实践需要与特定的学术概念对话,如统一战线与政治统合对话、群众路线与政治联结对话。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分类推进,针对不同的政策实践采取不同的创新策略。

其次是增强概念与理论创新的系统性。当前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创新存在低层次问题,原因之一就在于一些概念和理论创新处于孤立状态。概念与概念、理论与理论之间无法形成有机联系。对此,需要增强概念与理论创新的逻辑性,为“概念孤儿”“理论孤儿”寻找到合适的体系定位。“新概念的逻辑层次在哪里、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各是哪个”“新理论的出发点在哪里、与既有的理论体系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是概念与理论创新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最后是提高自主知识体系的全球传播。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绝非闭门造车,这需要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研究者需要避免简单套用国内政治术语,使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话语、数据和方法阐释中国实践,增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性和说服力,在坚持中国立场基础上,推动与世界多元政治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彰显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最终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以标识性概念引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郭道久

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赋予中国政治学人的紧迫使命。在这一宏大进程中,“标识性概念”的锻造与引领,具有基础性、枢纽性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是知识体系成熟的标志,更是理论创新的引擎和话语建构的基石。不断凝练标识性概念,是系统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向。

一、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标识性概念

标识性概念是理论原创性的直接体现。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是否具有自主性与原创性,首要标志在于其是否拥有一系列能够准确捕捉自身实践特质、有效解释自身发展逻辑的核心概念。学科的标识性概念支撑着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产物,它不可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必须生产自身的概念。在四十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政治学在不断总结自身实践、形成新的理论的同时,也在不断产出标识性概念。比如,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观的基础上,中国学者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对立或合作关系,是基于他们不同的利益需求,从而产生出利益政治观这一新的标识性概念。

标识性概念是实践经验的升华。中国政治实践,尤其是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制度创新与治理智慧。然而,若这些经验仅停留在故事层面,则难以升华为具有普遍对话能力的理论贡献。标识性概念的提炼,正是将独特的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化淬炼的过程,使之超越特殊性的描述,触及政治运作的某些共通机理,从而为认识和理解政治现象提供新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比如,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各级政府大体都管相同的事这一实践经验,提炼出“职责同构”这一标识性概念,并成为分析中国政府运行过程和特点的重要工具和理论。而实践需要研究者去主动了解和掌握,以调查研究为核心的“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方法和理论总结自然诞生。

标识性概念是知识生产的重要载体。成熟的政治学知识体系需要若干标识性概念作为节点,通过严谨的逻辑演绎和经验验证,形成层次分明、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标识性概念成为整个知识体系的关键节点,支撑着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大厦,推动着政治学知识的体系化,避免知识生产的碎片化。比如,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直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服务,“群众路线”就是基于实践的标识性概念提炼。“治理”概念本身是西方政治场景的产物,但被引入中国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而与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践相适应,成为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的标识性概念。

标识性概念是话语权竞争的重要工具。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还承担着国际话语权竞争的重要使命。政治学的学术话语和概念生产长期为西方某些学派或国家占据,中国政治学要摆脱概念和理论消费者的角色,就需要从自身悠久治理传统与当代伟大变革中,提炼出具有强大解释力和标识度的概念,从而在关乎自身道路与命运的根本性议题上掌握话语权。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有力回应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锋利武器,它深刻揭示了中国民主相对于西方选举民主而具有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优势。

二、标识性概念生产的未来路径

一是标识性概念生产要坚持主动性和精细化。广大政治学人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承担提炼基于中国实践、表达中国经验的标识性概念的重任。这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甚至可以上升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战略高度。同时,概念生产必须严格谨慎,要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真问题出发,在充分把控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基础上,遵守概念建构的规范化程序,确保概念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避免为概念而概念,导致概念漂浮和虚化。概念生产以中观层次为主,既要反映中国复杂政治现象的整体状况,又能客观表达中国政治的运行机制,将规范价值与实践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概念要体系化,避免概念孤岛。作为政治学知识自主知识体系重要构成的标识性概念不应孤立存在,而应成为知识生产网络的枢纽性节点。目前一个现象是提出的概念不少,受到的关注不多,难以形成通约性概念。这表明某些概念可能仅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和微观层次,缺乏足够的理论抽象与学理纵深,没有上升到总结规范价值、反映整体规律的高度。标识性概念的体系化,一方面要建立概念群,围绕一个核心概念,形成层次分明、组织有序、相互关联的概念集合,进而构建分析中国政治的复杂系统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要以概念为基础生产系统性知识,即以标识性概念为起点,发展出中层理论,进而衍生出相应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与研究技术。

三是要以长期主义研究促标识性概念生产。标识性概念生产必须深植于中国丰富的政治发展与治理实践之中,而对实践的把握又必须以深入的田野调查、长时段历史研究、比较案例分析和大数据追踪为基础。这就决定了追求短期效应的研究很难产出标识性概念。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需要改革学术评价体系,加大对原创性概念、基础理论研究和长时段深耕的激励和保护,抑制短平快的重复生产以催生标识性概念。

四是要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标识性概念虽然是服务于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但也需要通过融通古今中西,激发概念的思想源流。一方面,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挖掘,运用现代政治学的方法,结合当代中国的治理实践,对其进行创造性诠释,提炼出具有文明底色的标识性概念。另一方面,要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乃至其他文明的成果,在深刻理解、批判性辨析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的借鉴、改造与融合。

五是要加强传播与话语权建设。基于中国语境的标识性概念,还需要进行有效的国际化学术转化,嵌入国际学术共同体,引发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争鸣。因此,在进行概念提炼时要清晰阐述其特定语境、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并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对话,使其成为国际学界讨论相关问题时无法忽视的重要学术资源。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精心组织,加强学术翻译的专业队伍建设,将标识性概念及代表性成果译出来并推出去。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

漆程成

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是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西方凭借其先发优势,形成了一套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民主话语体系,并试图将其塑造为“普世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和发展,为认识民主的多样形态、阐释中国民主的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标识性概念:构建民主话语的中国坐标

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石,标识性概念集中体现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标识性概念的形成,源于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推进,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创造性地生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这一知识体系的统领性标识。它超越将民主简化为“选举民主”的狭隘理解,以“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为内涵,构建完整的民主认知框架,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

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逐步形成了若干相互支撑的概念群。在民主形态层面,“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法治民主”等,通过民主集中制、多层次协商渠道、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将民主嵌入党的建设、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全过程。在制度安排层面,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回答了通过何种制度渠道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在执政方式层面,“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为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提供了组织原则和工作路径。

在价值内核上,“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了民主概念群的价值坐标,并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链条具体落实。在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突破了西式民主的话语窠臼,为阐释当代中国民主的制度逻辑与实践形态提供了具有主体性的分析框架。

二、原创性理论:揭示中国民主的内在逻辑

在概念清晰化的基础上,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体现在一系列揭示中国民主内在逻辑的原创性理论命题之中。这些命题围绕中国民主“何以可能、何以有效、何以可持续”展开系统阐释。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理解中国民主最根本的理论命题。其揭示了中国政治“三统一”的复合民主结构: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核心,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三者深度融合,形成纵向贯通、协同增效的“合力效应”,超越了西式民主强调权力制衡和横向分立的逻辑。

中国民主强调把价值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实践,追求“管用”的民主。在此意义上,“实质民主优于形式民主”的命题,正是对西式民主重程序轻实质的驳斥,其主张民主的价值应当体现在通过有效制度实现国家良政善治和社会安定有序上。

相较于西方基于利益集团竞争、导致社会撕裂和决策僵局的“对抗型民主”,中国民主是“共识型民主”。其核心在于通过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在决策前后充分汇聚民意、凝聚共识,并与“民主集中制”相结合,形成既有广泛参与基础又具高效执行力的公共政策过程。这种“寻求共识”的运作逻辑,有效克服了西式民主“否决政治”的弊病,实现“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辩证统一。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文明土壤孕育不同民主形态。中国民主是“在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等政治智慧,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立场,并结合现代治理需求进行创造性发展。这一理论破除了“西方中心论”,为世界民主多样性提供了学理支撑。

三、文明价值:拓展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视野

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其意义远不止于阐释自身经验,更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丰富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中国智慧。

首先,它打破了西式民主话语的垄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丰富实践证明,民主不存在唯一模式,各国完全可以走符合自身国情的民主道路,从而打破“历史终结论”的西式民主神话。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论自信与实践参照,推动了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

其次,它提出了衡量民主制度的“中国标准”。习近平总书记以“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和“八个能否”系统阐明了评价民主的重要标准,实质是摆脱西式民主唯选举论的民主叙事,强调民主重在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这套结果导向的民主标准,有利于引导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治理绩效与人民获得感。

再次,它探索了一条民主治理的新路径。面对全球“治理赤字”,中国“共识型民主”与高效治理相结合的实践,展示了民主政治整合社会关系、提升国家能力、推进长远发展的优势,为破解决策低效、社会分裂等世界性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最后,它丰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内涵。中国民主实践把民主、公平、正义等价值落实到国家治理和民生改善之中,彰显民主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民幸福、促进共同发展,表明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安全、共同发展是民主政治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述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新时代以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深化,为中国民主知识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向未来,应立足中国民主政治实践,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民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立足中国民主的生动实践,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形成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命题,创造具有世界意义的知识成果。其根本旨归在于,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以中国经验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在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增强中国民主理论的主体性、原创性和国际影响力。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

